

# 往事拾零

(本文插圖刊第八頁)

## ●夏鐵肩(中國文藝協會理事長)

### 最愛閱讀文藝書刊

喜歡文學的人，最初多半喜歡詩。我十一、二歲的時候，曾經囫圇吞棗地熟讀過三幾百首傳統詩，包括一小部分宋詞和元曲，朦朧朧朧的似懂非懂，但很喜歡那種令人神往的感性意境。隨後開始接觸到一些新文學初期的白話詩，新奇中也有另一種不同層次的韻味。新詩抒寫內心潛藏的情懷，照樣能成爲引發第三者意緒反射的激素，在感受上與讀傳統詩沒有甚麼不同，所以從此也很喜歡新詩。

記得最初讀謝冰心的「繁星」和「春水」兩本詩集，很受感動。以後慢慢又陸續讀到更多其他詩人的作品，像徐志摩、朱自清、俞平伯、朱湘、宗白華、梁宗岱、胡適、劉半農、聞一多、李金髮等人的詩作詩集，大概都很少放過。讀多了，興趣便像鯁魚的腳，向更廣闊的四周延伸。雖然並未放棄對傳統詩的愛好，但真正着迷的是白話詩。等到了中學，作文課遇到極心的題目，常會試着把它寫成白話詩，有時靈感如泉，一個勁把整本作文簿寫完，還要再加添一本半本才

罷了事，讓國文老師感到非常頭痛。

中學時代是求知慾最旺盛的時期，那時我就讀於一所執事子弟學校，校方對學生的管理和要求都很放鬆。我對自然科學課程並非完全沒有興趣，由於老師傳道授業的方法實在不怎麼靈光，上課硬是打瞌睡；想保持清醒的惟一辦法，就是看課外書籍。那些課外書絕大部分都是文藝讀物，如倪貽德的「玄武湖之秋」；郁達夫的「沉淪」；巴金的「愛情三部曲——霧、雨、電」、「春天裡的秋天」、「滅亡」；茅盾的「茅盾三部曲——幻滅、動搖、追求」(本名「蝕」)、「子夜」、「虹」、「三人行」等。都是那時我一位堂兄十哥最先借給我看的，印象最深。後來十哥隨七哥去南京讀書，還不斷寄些新書給我，只是我閱讀的速度相當快，每個月三兩本新書是填不了慾壑的，尤其是癩頭越來越大之後。

### 見書就買無所不看

那個年代，長沙的書店有好幾家專門經銷上海書商出版的新文學書籍，像商務、開明、北新、良友、生活、大東等是最有名的幾家，幾乎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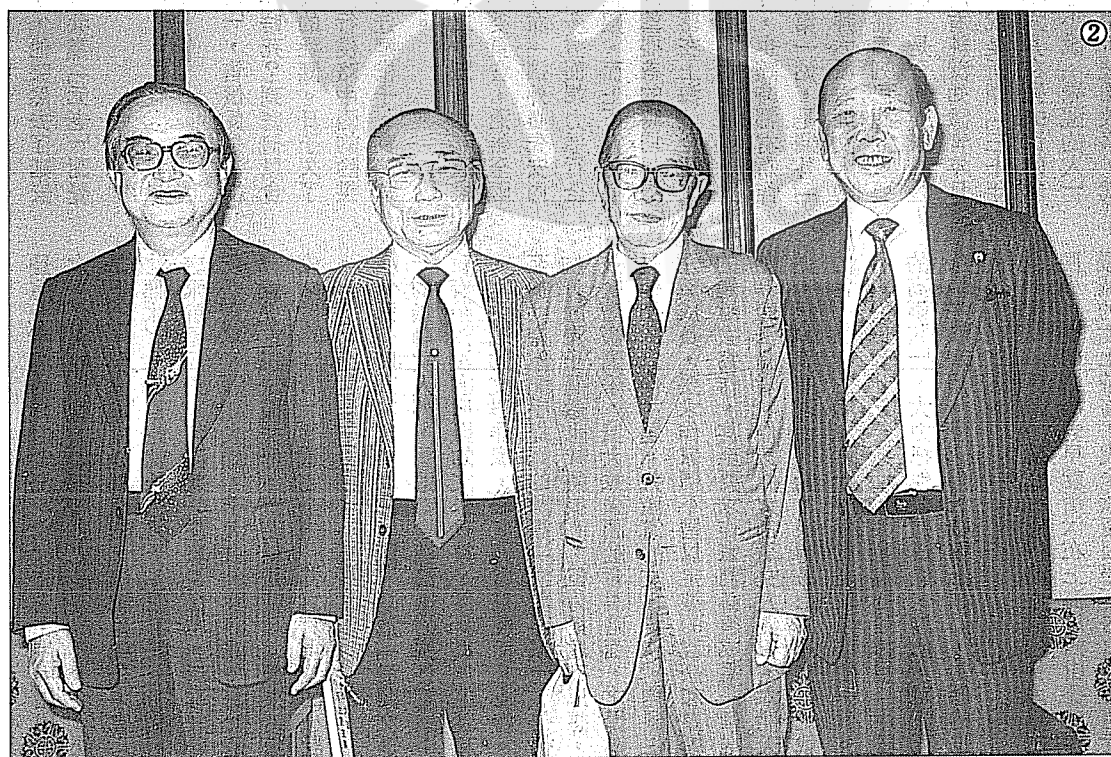
個月都有很多新書出版發售，只是版型不統一，有些名家的暢銷書，還故意裝訂成毛邊，不把它切齊，買回得自己費一番手脚自己切開。記得首先是魯迅寫文章反對這種裝訂方法，後來到民國廿四、五年，就再看不到這種式樣的書了。不管怎樣，這些新書全對我有極大的誘惑力。那幾年中，大部分知名作家的作品，包括散文、雜文、長短篇小說、戲劇、文藝理論、翻譯作品，當然還有詩集，見到就買，無所不看，胃納之佳，至今還引以自豪。儘管高中幾何只考三分五分，被老師斥爲「簡直太不像話」，也毫不在乎。

後來改讀師範學校，舊習未改，同學中有共同癖好的頗不乏人，現在同客臺灣的袁陔九(應未遲)就是其中之一，他以喜歡專門購讀作家選集聞於全校。另有一位同學謝惜零，平時高自崖岸，不怎麼合羣，課餘也喜歡閱讀文藝書籍，唯有他長期訂閱了兩三份上海出版的文學雜誌。我則不拘一格，甚麼書都買，甚麼書都看。新文學書刊之外，那時坊間風行一種一折書，全部平裝本，紙張、印刷、校對都還挺不錯，多半是古典文史類的書。其中章回小說、通俗演義、傳奇小



①本文作者夏鐵肩（左）與董樹藩（右二）合影。

②右起：夏鐵肩、張棟材、李嘉、邵德潤合影。



說、筆記小說、蠶蝴蝶派小說，幾乎無一不有。定價一元的只售一角，定價一角的只售一分，便宜得不得了，一百塊袁大頭怕不可以買回一兩千冊。這類書我也買得很多。我會吹牛，中國的舊小說恐怕被我看光了。

### 影響我的兩篇文獻

民國二十五年，有兩篇重要文獻對我影響很大。一篇是蔣委員長五十華誕發表的「報國與思親」，一篇是蔣夫人宋美齡女士的「西安半月記」，也就是西安事變給予全國人民的強烈震撼，從這個時期起，我漸漸開始注意時事與政治上的問題。即使是閱讀文學書刊，也常會很自然的去留意那些作家或出版物的政治背景。我至今記得七哥有次對我說過的一段話：「現在的青年人，就好像坐在一間昏暗的屋子裏，周圍有許多魔鬼的黑手都在想攔住你，你必須睜開你心靈裏那雙眼睛，看清楚周圍有些甚麼樣的黑手。」多年來，我還常把這些話轉告給我年輕的人。

前面提到的那個同學謝惜零，他雖然也愛閱讀文學創作，但他自己學習寫作的成績並不好。他喜歡去留意當時的文壇動態，更喜歡留意當時「左翼作家」的文藝理論路向，自以為前進和時髦。共黨文特周揚喊「國防文學」口號的時候，他曾傳播「國防文學」的言論；後來胡風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他的口風也就跟著轉變。我有位堂兄夏卓然是學生自治會主席，有次指着他的鼻子斥問：「你已經營了共產黨是不是？」他雙手直搖，連說：「我不是，別亂說！」

「可是不久，就在畢業的前夕，他突然去了延安，我們這時才知道，他原本是共黨「元老」謝覺哉的親姪子。」

### 一折書藏有大陰謀

關於前面提到的「一折書」，售價真是連紙張錢都不够，那印書人豈不要賠死？到底何以會這樣便宜？總是大家一個老大的疑問。日子久了，才知道那是日本軍閥企圖遂行侵略中國的陰謀之一，是一粒「暗藏春色」的迂迴棋子。實情却是說來話長，牽扯的線頭也多。

民國二十一、二年到民國二十五、六年這段時期，先是國民政府成立軍事委員會，通告全國準備長期抵抗日本侵略；旋宣布「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全力剿共。同時也多方面竭力進行全國性的各項建設工作。國步雖艱，而上下人心振奮，生機蓬勃，是國民政府威望鼎盛時期。這個時期，全國文學活動的重心落在上海，全國文藝界鋒頭最健的人物，大部分都集中在這座十里洋場上，每天都有新作品問世，也隨時都有新作家成品；它是海外回國作家的第一站，是關外「反偽抗日」作家的燈塔，是禮拜六派有閒文人的發祥地，是共產黨文化特務散播馬列思想的重要據點。總而言之，當時的上海，是全國作家視為爭名爭利的「朝市」，是令所有純潔知識青年目眩神迷的大觀園。那個年代，就是所謂「三十年代」的全盛期。民國七十二年六月在臺去世的老作家孫陵兄，早年有一部長篇小說「覺醒的人」，他曾請我寫了一篇長序，書中所敘的故事，就

是這一時期的真情實況。我還特別在序中指出這本小說裏的人物，如王燭塵就是王統照，黎寧就是巴金，鄭水如就是郭沫若，陳霜冕就是茅盾（沈雁冰），陳言詩就是沈起予，蘇雨就是胡風，秦飛就是周揚，何淺就是洪深；江布、江雪夫婦就是蕭軍、蕭紅夫婦，于大白、張醉雲夫婦就是郁達夫、王映霞夫婦，黃菱就是藍蘋（後來到延安才改名江青）。這完全是一部寫實主義的小說。

那個時期的文學作品，除了專搞「消閒文學」的無聊文人外，普遍都含蘊濃厚的抗日意識；政府雖然沒有明顯的文學政策，但對民族主義和人文主義的文學作家，一直非常重視而且支持。至於共產黨黑手提調的所謂「左翼作家」，他們的抗日的調子偶然也喊得很高，但傳播馬列思想，鼓吹階級鬥爭，擴大並強調社會黑暗面，才母寧是他們的寫作主題。共產黨的文化特務，控制住左翼成員，要求作家們不惜以定型的觀念和虛構的題材去寫作，甚至要求作家們必須成爲一個唯物辯證法論者。作家們大都是文人氣質，本性天真，根本沒有政治警覺，很容易上共黨文化統戰的當，像「左聯主席」魯迅就是最顯著的一例。魯迅於民國廿五年逝世，共產黨把他捧爲「中國的高爾基」，大力把他製造成偶像地位，可謂死後還在被利用。魯迅尚且被誘上賊船，其餘的也就很難怪了。

這種種景象，看在蓄意侵略中國的日本軍閥眼裏，立即命令老早就潛伏在上海以內山書店作機關的文化特務，設法積極因應。內山當時進行

了兩項陰謀工作：

一項是與中國消閒派文人，包括部分前清的遺老遺少，以「文酒之會」作幌子，與這夥人建立友誼關係；進而提供古典藏書，供應鉅額資金（內含其國內生產過剩滯銷的白報紙），並收買上海出版界的奸商，大量發行所謂「一折書」，目的在於對消中國新文學作品表現在抗日意識上的力量，同時企圖把中國知識分子的智慧興趣和意志力引接到一個脫離現實認知的空檔中去。這一番煞費苦心的曲折謀略，雖然日後證明它收效並不大，但日本人居心之陰險惡毒，至今想起來還是覺得非常可怕。

一項是以曾經留學日本的中國作家爲目標，分別建立友好關係，魯迅自然是內山爭取的最大目標。先是魯迅遭際窮蹙時，多方掩護及援助；而在魯迅被左派攻擊時，又熱心提供研究資料，勸說魯迅加強反擊。後來更促成魯迅與共產黨取合作態度，其主要目的，實際上是利用魯迅去增強「左翼」的氣燄，好讓日本軍閥「聯俄防共」的口號容易爲我政府接受。這項陰謀比前一項惡毒得多，可見日本當年侵略中國，是如何的在多方面運用手段，而且無所不用其極。

## 抗日文化宣傳活動

民國廿六年七月七日，蘆溝橋的炮火，終於使日本侵華的野心圖窮匕現。那時我正在湖南一個小縣城實習，辦了一個民衆識字班。縣城雖小，隔省會長沙很近，許多事每得風氣之先。抗戰爆發的消息傳來，民心非常激動，所有機關學校

工商團體立即成立抗敵後援會，發動大遊行，擁護政府長期抗戰。並分別組織宣傳隊，到各鄉鎮農村去宣傳。「八一三」淞滬戰事，硬碰硬打了三個月，國軍浴血奮戰，傷亡慘重。政府爲示抗戰到底的決心，宣布遷都重慶，軍政重心則暫時西移到武漢。

湖南是通往大後方的重要交通樞紐，那時被劃爲第九戰區，成立了許多兵站、傷兵醫院、補充兵訓練處和許多後勤單位。每天有許多傷患從前線搶救下來，也有一批整訓好的部隊開拔到前方去。加上從華北和東南戰區逃難路經湖南的商民、奉命撤退的公私機構人員、文化人、流亡學生，總的流動人口每天何止數十百萬？造成了長沙及其他各縣市前所未有的繁榮。

那時長沙的文化宣傳活動，隨着戰局的發展顯得非常熾烈。街頭巷尾貼滿各式標語、漫畫、壁報，街頭劇和街頭演講隨處可見，報紙副刊和文藝作品的出版更形熱鬧。像中央日報就已經從南京先遷到長沙，出版了一段時日，才又再遷到重慶，卻爲長沙留下了一個中央日報分版。作家們到過長沙，住過長沙的也很多。湖南籍作家先後回過家鄉的像田漢、謝冰瑩、黎烈文、沈從文、易君左等都曾受到新聞界和文藝界的熱烈歡迎。易君左回湘之初，還替湖南通俗日報特別編過兩版副刊，大概總有個把兩個月的樣子。後來郁達夫來到長沙，易君左邀郁達夫到他老家漢壽小住，好像就沒有再編下去了。郁達夫那時與王映霞已經鬧翻，情緒惡劣，很少發表文章，倒是寫過好些舊詩發抒鬱悶，哀怨如不自勝。

## 左派分子令人側目

亡命日本潦倒了十年的郭沫若，在「八一三」以後，忽然「摒婦拋雛」，離日返國，在報上發表了一首感懷步魯迅原韻的七律，中有「去國十年餘血淚，登舟三宿見旌旗。願將殘骨埋諸夏，哭吐精誠賦此；」兩聯。詩算不得甚麼好，但詞旨看起來很慷慨，所以也頗爲人傳誦。蔣委員長不責郭沫若又感激涕零的寫了一篇晉謁經過的文章，極盡善頌善禱的能事，後來收在那本「在轟炸中來去」的集子裏。到廿七年初，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成立，政府起用郭沫若，昇以政治部第三廳中將銜廳長的職務。一時許多文藝作家和影劇界人士紛紛被羅致到三廳去工作，其中不少是左派分子，如田漢、洪深、陽翰笙、應雲衛、陳白塵、倪貽德等一千人，他們在這頂「保護傘」下，穿起軍裝，足登長統馬靴，招搖過市，成爲最令人側目的一羣。

廿七年初的武漢文壇，分子很雜，步調很亂。除了共產黨利用機會拚命搞發展外，還有馮玉祥、李宗仁、閻錫山這幾個人也在搞個人的文化勢力。馮玉祥發明「丘八詩」，隔不了兩天就要寫幾首送到報紙或雜誌上發表，有兩天不寫或詩不見報，就很不過癮。還把幾個華北出來的作家，如老舍、老向幾個接到家裏住，尊之爲老師，厚致束脩，以便隨時替他捉刀。閻錫山是第二戰區司令長官，在臨汾辦了一所「民族革命大學」，招致知識青年；又專一拉攏文藝作家，出大價

錢給別人辦雜誌，自己並不出面，一切由他姪兒閻振溪負責進行。像東北作家羣如蕭軍、蕭紅、羅烽、北朝等，就都和閻錫山關係相當熟絡。至於李宗仁，他是第五戰區司令長官，他身在皖鄂地區，卻時刻不忘廣西的老巢穴。他在武漢的活動，都落在共黨文化特務的眼裏。與其說他在武漢建立了甚麼文化勢力，不如說共黨利用他建立了日後在桂林的文藝鬭爭的勢力。只有隨中宣部從南京到武漢的作家王平陵，看到作家們那樣散漫，認為光搞小圈子活動，如何能發揮文藝貢獻抗戰的大力量。因而在奉到中宣部指定要他籌劃統一全國性文藝組織後，便竭智盡力，奔走協調，總算在廿七年三月間，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終告成立。大會出席五百多人，選出張道藩、王平陵、巴金、茅盾、朱自清、徐蔚南、老舍、田漢、郭沫若、郁達夫、陳紀滢、丁玲等三十一人為理事。名單上都是够分量的人物，很具代表性，也很有團結的意味。只是大家都知道武漢是守不住的，雖然辦了不少文藝刊物，卻並沒有顯著的成就。喊了一陣子「文章入伍，文章下鄉」的口號，聽來很時髦，實際就是「舊瓶新酒」的通俗文藝，目的在於適應知識水準偏低的所謂兵農階級，也就是日後共產黨搞「工農兵文藝」的前導。像老舍、老向改編的大鼓書、彈詞和數來寶，田漢寫的改良湘劇，以及一般流行的故事新編等等，初看還有點新奇，久了就全變成了「八股」，誰看了都討厭，漸漸無疾而終。

## 寫下「血鐘響了」長詩

「八一三」以後不久，幾位友好邀我合辦了一份文藝刊物，命名「血鐘文藝月刊」，寫稿、拉稿、編校、發行大家共同負責。有時也轉載一兩篇知名作家的文章撐場面。初時興致很好，在創刊號上，我寫過一首「血鐘響了」的長詩，以後每期也都有詩和雜文、散文發表，還寫過獨幕劇。那些「玩意兒」自然很幼稚，不過從實際工作中卻得到許多寶貴的經驗。可惜發行不到十期，二十七年五月間，因為我到漢口去探望七哥，其他成員或投筆請纓，或另行參與其他更直接的抗戰工作，於是這份刊物就不得不悄然的停辦了。

我在漢口只住了一個禮拜，正好碰上我們空軍遠征日本，在九州、長崎、佐世保等幾個城市的上空散發了大批傳單之後，安然飛回來，日本防空部隊竟然完全沒有發覺。這是條震撼性的新聞，日本軍閥大失面子。七哥預料武漢日內必將遭受日機大轟炸的報復，並預測武漢頂多還能守上三、五個月，他叫我趕快回家，他自己不久也將回家。在漢口我看到聽到一些我想聽聽的人事物，也看到聽到一些令我失望氣惱的人事物，這也算是一種收穫，這與我後來決心投考戰幹一團（中央軍官學校第十六期）受訓大有關係。

## 隨戰幹團千里行軍

廿八年八月，我隨戰幹一團第四總隊三千里長行軍，到達了四川綦江，準備等候畢業分發。忽然中央訓練團成立新聞研究班，需要選拔一批戰地新聞工作人員，接受短期的專業訓練，然後

分發到各戰區去辦「掃蕩簡報」。我因緣時會，倖獲錄選，隨去重慶附近的沙坪壩報到，這裏是新聞研究班第一期受訓的所在地。廿九年又續辦第二期，便遷到浮圖關（後改名復興關）去了。

在受訓的那段日子，白天全部是上課和實習，晚上則經常要躲警報，不躲警報便去參觀重慶各報社。我曾稍稍留意過那時重慶文藝界的活動情形，發現報紙副刊上討論「抗戰文學」和「民族形式」的爭論頗為熱烈，胡風和郭沫若都發表了長篇大論的文章，新華日報還藉機大開座談會，進行掛羊頭賣狗肉的陰謀活動。

而作家們發動前線勞軍或戰地訪問的也不少；只是文學刊物不多，創作出版也很零落，我看過巴金的「春」、姚雪垠的「差半車麥稈」，張天翼的「速寫三篇」等幾本書，好像都還不是在重慶出版的。倒是音樂和話劇的活動，表現得頗為積極，「中國萬歲劇團」就是那年成立的，全國從事影劇的精英，如陶金、白楊、舒繡紋、趙丹、井淼、房勉、田琛、王豪等都集中在這個劇團。劇作家田漢、洪深、余上沅、熊佛西、宋之的、夏衍、于伶、袁俊、吳祖光、李健吾、歐陽予倩、曹禺等也都有很認真的創作。

## 到前線辦掃蕩簡報

在新聞研究班畢業後，我奉派到皖南徽州的第二十三集團軍辦掃蕩簡報，覃子豪分發到浙東的第十集團軍，張萬熙（墨人）分發到贛北的第三十二集團軍，第二期的張煦本分發到浙西的第一游擊區總指揮部。我們同屬第三戰區長官部，

長官部在江西上饒。

二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唐式遵很重視掃蕩簡報，收復太平縣城時，函獲了一家敵偽報紙的印刷工廠，便立即撥交給我們，並且全力支持我們改出四開鉛印日報。這是一張沒有廣告的報紙，副刊、特稿和專欄報導的比例很重，新聞也很突出。因此與後方、大後方多家報紙訂立交換契約，還頗受歡迎。只是戰時交通不便，重慶、昆明、貴陽、桂林、長沙等地的報紙，收到常在半月之後，就是上饒的前線日報、金華的東南日報、浙西於潛的民族日報，也要三、四天才能寄到徽州。

## 見見三十年代作家

二十九年那個多雨的春末夏初，正是國軍江南攻勢勝利結束之後，我曾到桂林一行，主要的任務是到中央無線電機製造廠去領取一部超外差式收音報兩用機，並學習使用方法和收報技術。在桂林會晤了各戰區簡報單位負責人二十餘人，全部是新聞研究班第一期的同學。把酒縱談，各有佳況，大家莫不欣慰。

「桂林山水甲天下」，何況又是抗戰時期大後方著名的文化城，於是我們臨時組織「各戰區掃蕩簡報觀摩團」，洽由桂林行營政治部協助安排，讓我們參觀訪問了桂林各新聞文化機構社團及風景名勝。同時也認識了一大羣「三十年代」的名作家、詩人、畫家、劇作家、藝人等。他們有的是武漢撤退前後，由李任仁和李濟琛分別邀約來的，也有些純是逃難，在桂林中途歇腳，將

來還要到重慶、昆明、香港或其他地方都不一定。廣西一向被李宗仁視為私人禁區，抗戰發生後，他時時不忘記培植自己的勢力，拉攏文藝作家也是重要的一環。他不知他拉的人，也是共產黨要拉的人，而且很多人明明白白就是共產黨。那時集中在桂林的知名作家真不少，記憶中有田漢、夏衍、艾青、艾蕪、王魯彥、胡愈之、聶紺弩、穆木天、舒羣、馬凡陀、范長江、黃藥眠等人，其中范、黃二人，就是人所共知的共黨分子。

我到桂林的第二個禮拜天，木刻家陳頤樸夫婦邀我和詩人雲帆遊七星岩，途中巧遇巴金和一位同行的陳小姐；陳頤樸夫婦和巴金很熟，連忙介紹，才知道他們先一天才從昆明到桂林來。巴金那天穿一套法蘭絨淺色西裝，戴一付金絲眼鏡，手裏拿支司迪克，風度十分瀟灑，陳小姐像小鳥依人似的一直偎着巴金，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就是後來的蕭珊，很可能就是。那天晚上，陳頤樸夫婦堅請大家在紅棉酒家吃飯，席間，巴金很能喝兩杯，也很懂得食道，說話總是不快不慢，顯得很有修養，對抗戰前途很有信心。後來在另一次飯局中，我認識了孫陵，那天巴金和陳小姐也在座。孫陵那時很年輕，才二十六歲，有位女士盛讚道：「不僅是個偉丈夫，也是個美丈夫。」只見他滿面紅光，意興風發。酒喝得多，話也說得很多，滿座為之傾倒。真沒有想到他晚年竟是那樣頹廢以終，令人不勝嘆惋。

那時救亡日報已遷到桂林出版，聶紺弩任副刊主編，那裡幾乎成爲左派文藝作家活動的大本營。副刊上發表的文章或詩，清一色是小圈子作

品。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們葫蘆裡賣的是甚麼藥。

## 負荷沈重心情愉快

我在桂林停留了將近一個月，回到前方去的時候，帶了一部收發報機，還有自己買的和別人送的四百多冊新書，負荷沈重，但心情甚爲愉快。

在三戰區頗具權威的報紙是東南日報和前線日報。東南日報的副刊「筆壘」，更爲大眾矚目的高水準文學園地，經常有名家作品見報，也經常有文學論戰發生。有次覃子豪兄發表了一首詩，題爲「給我一桿來復槍」，收在他的第一本詩集「戰地的旗」裡，這原是詩人的一種比興，寫他內心的一種激動，沒有甚麼值得疵議的；但是幾個左派仁兄卻借題發揮，對子豪加以十分尖酸刻薄的諷刺。當時我爲此事寫了篇短文，說子豪不僅有枝寫詩爲文章的筆，而且早就握有一枝專打敵人的槍，並且說出他當時的軍階是步兵中校。總算以後沒有人再繼續作邪惡的挑釁了。

## 覃子豪批駁曹烏鴉

那時還有個左派尾巴號稱「烏鴉」的曹聚仁，他根本不懂詩，卻又瞧不起詩，偏偏要寫論詩的文章，惡意鄙薄白話詩人。因此在「筆壘」上引發了一場關於新詩的大論戰，許多詩人對曹烏鴉羣起而攻，最後子豪寫了好幾篇極有分量的長文批駁他，等於替他從頭到尾上了一課，其中有兩篇收在子豪去世後朋友替他出版的「覃子豪全

集」裏，可惜還有好幾篇跌失了。這場論戰，長達兩三個月之久，墨人也曾根據曹烏鴉的論點，指出他的荒謬無稽，幼稚不學。這樁當年東南文壇的大事，想必還有許多朋友記憶猶新。

### 鐵陀苦讀寫小文章

「珍珠港事變」那天，是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我正好離開莫干山到了西天目山，浙西行署主任賀揚靈留我在浙西工作，先發表參議，後兼青年招待所主任，所址在中天目山的普照寺。工作規律，生活單純，環境幽靜，我這一年真像個修行的頭陀，抖擻精神，一無煩惱，着實讀了一點書，也寫過一些小文章在東南幾家報紙的副

刊上發表，用的筆名就是「鐵陀」。還寫過一部四幕劇「皖南風雨」，寄到金華出版。

三十一年冬天，睽九自昆明來信，說他正籌劃創辦一家規模相當大的出版公司，希望我去昆明幫忙，函電交馳，情辭懇切。我不好拂他這番盛意，因而以返湘省親為名，堅辭現職，耑程赴滇。不料剛到湖南，睽九卻先有來信，說出版公司的事，遭遇了意想不到的阻礙，短期難以實現，問我願意屈就中央通訊社的外勤工作否？這時恰好九戰區也有親友邀我，我就決定留在湖南，幹的是拿槍桿兒的軍人，與日本鬼子作生死搏鬥的軍人。文學、文學，這兩年是邊兒都沾不上了。

## 西笑記

·王慰親·

一對即將結婚的年輕夫婦到近郊看房子，在滿意地找到了喜歡的地點後即驅車返家。但不久，女方發現他們的新屋並沒有廁所「Water closet」。至少他們還沒發現一個。

於是他們寫信給屋主詢及「最需要的方便之處在那裏？」但是很含蓄地將「Water closet」隱指作「W.C.」。

當然，屋主對「W.C.」並無絲毫概念，於是他請教一些朋友；答覆是「W.C.」意指「Wetstelan Chapel」——所禮拜堂的名稱。於是屋主寫了這樣的一封信：

謹覆來函，「W.C.」位於貴宅九哩遠處，我承認這個距離對你們來說是遠了一點；但如果你們養成經常去的習慣，你們將樂於知道許多人在該處午餐並待上一整天。其餘沒有車的人，也乘坐從不誤點且領有執照的巴士前往。做夫婦於六年前曾往該處，那時前往人潮之多，使我們只有被迫站著。不諱言的，那使我們不便常於前往。那裏實在是個迷人的地方，設有三百個座位及多過五十個的站位。同時，你可能對今年即將舉辦的義賣活動感興趣，該項義賣是爲了籌募基金作爲增添「W.C.」一個久已感到需要的設備——絲絨座椅而舉辦的。

### 但願得見偉大鉅著

八年抗戰，烽煙萬里，中國軍民以血肉抵抗暴虐凶殘的日本軍，經歷多少驚天動地的大戰役，發生多少可歌可泣的小故事，以文學的觀點看，這真是一個亙古所未曾有過的偉大時代。然而，這個時代完全被禍國殃民的共產黨利用了；抗戰勝利的果實也被共產黨一手攘奪，一口吞噬了；而崇高的文壇，聖潔的文學，也被共產黨的政治陰謀手段污染了，扼殺了，以致在文學創作上雖不致完全一片空白，卻也幾乎等於一片空白。已經三十餘年的時間，在自由中國的基地上，我們也始終還沒有一部真正的、完整的、能紀錄這個時代的偉大的文學作品出現。面對着歷史，思前想後，實在有愧於心，有痛於心，同時也有千萬個不甘心。人，必然是要老化以至死亡的，惟有偉大的文學將永遠活着。我們必須寄望於現存的有資格的老作家們，擱置一切不必要的俗務，澄清一下裝滿太多世故滄桑和愛患的腦海，廣泛蒐集整理目前尚未遺忘、褪色、消失的各種大小寶貴資料，有計畫的致全力於此一「名山事業」的偉大創作。抗戰勝利後，我奔波於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少有寧時，與文學的關聯很淺。在臺灣，雖然幹了十多年副刊編者，也始終只能算是一個靠在文壇邊邊兒上的旁觀者，純粹爲作家們服務，自己沒有創作，不能算是作家，自覺也沒有智慧能力奉獻於文藝創作，想到這樁大事，只有在這篇文章的尾巴上，向今日文壇的鉅子們作一次最誠摯的呼籲。